



文化研究 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of
Cultural Studies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

(2016)

陶东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禁书网

文化研究 年度報告

[201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

文化研究 Annual Report of Cultural Studies 年度报告

(2016)

● 陶东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年度报告. 2016 / 陶东风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4

ISBN 978 - 7 - 5201 - 2231 - 3

I. ①文… II. ①陶… III. ①文化研究 - 研究报告 -
中国 - 2016 IV. ①G0 -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8947 号

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6)

主 编 / 陶东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编辑 / 刘 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4.5 字 数:391千字

版 次 /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231 - 3

定 价 / 8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文化研究年度报告 (2016)

主 编 陶东风

执行主编 胡疆锋

副 主 编 邱运华 王德胜 宋月华

主 办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中国学者

陈光兴 高丙中 黄卓越 鲁晓鹏 陆 扬

罗 钢 汪民安 王 宁 王晓路 王小明

徐 贲 张英进 赵 勇 周 宪

外国学者

托尼·本尼特 (Tony Bennett), 英国开放大学 (Open University, UK)

西蒙·杜林 (Simon During),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University of John Hopkins, USA)

约翰·阿米蒂奇 (John Armitage), 英国诺桑比亚大学 (Northumbria University, UK)

约翰·哈特利 (John Hartley),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约翰·斯道雷 (John Storey), 英国桑德兰大学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UK)

编写组成员 (按姓氏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陈国战 陈天乐 胡疆锋 刘昕亭 刘雅芳
宋秋明 韦微静 徐 铮 张凯旋 赵静蓉

目 录

年度论文

- 3 从进步叙事到悲剧叙事
——讲述大屠杀的两种方法 / 陶东风
- 27 媒体中的“慰安妇”话语
——符号化的“慰安妇”和“慰安妇”叙事中的记忆/
忘却机制 / 宋少鹏
- 55 悲剧如何被“颠倒”为喜剧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土匪史实考释 / 张 均
- 72 什么是今天中国的“住房问题” / 王晓明
- 90 从五环到六环：北京城市边缘空间及其艺术再现 / 郑以然
- 107 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
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 / 王洪喆 李思闽 吴 靖
- 130 新媒介空间与青年亚文化传播 / 陈 霖
- 142 极端的艺术与欲望的政治
——网络官场小说的写作伦理 / 周志强
- 154 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网络文学“爽文学观”对精英文学观的
“他者化” / 邵燕君

- 172 | 当乡愁成为我们的情感结构
——电影《百鸟朝凤》与当代乡愁文化 / 唐宏峰

文化研究工作坊

- 183 | 新时期中国电影中的乡村教师形象研究(1978-2015) / 王 鹏
230 | 《新时期中国电影中的乡村教师形象研究(1978-2015)》写作过程

中国内地热点评述和研究综述

- 239 | 众声喧哗中的文化博弈
——2016年文化热点评述 / 徐 铮 宋秋明
263 | 文化研究：作为问题和答案的生产场域
——2016年度中国内地文化研究重要著述盘点 / 韦微静
288 | 中国内地文化研究大事年表 / 陈天乐

文化研究大事记

- 301 | 中国台湾 / 刘雅芳
318 | 中国香港 / 刘昕亭
327 | 美国 / 张凯旋
346 | 欧洲 / 赵静蓉

年度论文



从进步叙事到悲剧叙事

——讲述大屠杀的两种方法

陶东风*

摘 要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西方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伤性事件。如何书写和讲述大屠杀的故事，已经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问题。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所关心的，是如何将大屠杀这个特定的、情境化的历史事件建构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受难和道德邪恶的符号。基于其文化建构主义立场，亚历山大认为：这一个关乎大屠杀叙事的问题，必须通过一系列语言符号操作方式和叙述方式的转换，具体而言，就是从关于大屠杀的进步叙事转向关于大屠杀的悲剧叙事，才能完成上述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文化转化。经过这样的转化，大屠杀已经超越特定情境而变成普遍化了的创伤事件，至今仍然生动地“活在”当代人的记忆之中。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西方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伤性事件。这个事件对文学艺术，对文化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不亚于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西方普遍流行的文化创伤理论，相当部分聚焦于大屠杀。与此同时，如何书写和讲述大屠杀，乃至应不应该书写和讲述大屠杀的故事，也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阿多诺曾有惊人之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关于这句话的阐释至今在存在争议，但无人能够否认：大屠杀之后，文艺创作的正当性必须重新论证。大屠杀之后人们虽然依然在写诗，而且在写关于大屠杀的诗，但如何讲述大屠杀的故事，已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美学乃至伦理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在西方

*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汗牛充栋,几成一门专门学问。本文所介绍的讲述大屠杀的进步与悲剧两种方法,主要依据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创伤建构理论,同时也参照了其他学者或作家的相关著述。^①

一 创伤是一种文化建构

与弗洛伊德所代表的心理分析的创伤理论——亚历山大称为自然主义创伤理论或“常民创伤”理论(lay trauma theory)——不同,亚历山大认为:文化创伤不是自在的事实,而是文化的建构。也就是说,“存在一个阐释网格(interpretative grid),通过这个阐释网格,所有关于创伤的‘事实’才能得到媒介化——无论是认知上,还是情绪上和道德上。这个网格是一个超个体的文化网格,是被象征地结构和社会决定的。任何创伤都不能自己阐释自己。”(《文化创伤与集体身份》,英文版第201页,以下简称“英文”,《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中文版,周怡等译,第29页,以下简称“中文”)就大屠杀而言,大屠杀是否能够成为创伤性事件,成为什么样的创伤性事件,都不是纯客观的事实(比如死了多少犹太人)可以保证的,它必须依赖于文化建构;而文化建构本质上是一系列语言符号的操作,它可以集中表述为:我们应该如何叙述大屠杀?应该如何讲述大屠杀的故事?

亚历山大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一个特定的、情境化的历史事件,一个标志着伦理与种族仇恨,暴力与战争的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受难和道德邪恶的符号——一个普遍化了的符号,其存在为伦理

① 杰弗里·亚历山大的创伤建构理论及其在大屠杀研究中的应用,集中见于其两本论文集(均为合著)。第一本是《文化创伤与集体身份》(*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特别是其中的长篇论文《走向文化创伤理论》(*Toward a Theory Cultural Trauma*),是对其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的集中阐释;第二本是《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The Meaning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特别是其中的《道德宇宙的社会建构——从战争罪到创伤剧的大屠杀》(*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ral Universals: The Holocaust from War Crime to Trauma Dream*),是运用其文化创伤理论对大屠杀所做的个案分析,也是本文主要引证的文献。由于这篇文章同时收入他的上述两本书,而第二本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中译本(周怡等译),故本文对这篇文章的引用同时参照了中英文两个版本。为方便比照,在引用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在正文中的括号内同时注明中英文版本页码。

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正义，也为相互承认，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也为通过更加文明的方式解决全球冲突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中文 25，英文 197）这的确是任何研究大屠杀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灾难的学者必须认真严肃思考的问题，基于他的文化建构主义立场，他认为这一个关乎大屠杀叙事的问题，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语言符号操作，“一个特定的、情境化的历史事件”才能被建构为“一个标志着伦理与种族仇恨，暴力与战争的历史事件”或“一个普遍的人类受难和道德邪恶的符号”。这个建构过程，即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文化转化（cultural transformation）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经过 50 年的努力，灭绝特定人群（这里指犹太人群体）的初始历史事件，已经被重新解释为“整个人类的创伤性事件”。^① 经过这样的转化，这个已经超越特定情境而普遍化了的创伤事件，至今仍然生动地“活在”当代人的记忆之中。

那么，这个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在卢旺达、柬埔寨以及其他地区，都曾经发生过死亡人数不亚于犹太人的屠杀，为什么这些屠杀行为没有得到同样的普遍化转化，因而仍然被视作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特殊事件，而不是普遍的人类灾难？这些问题构成了亚历山大的核心关切。

二 为什么大屠杀不能被经验为非亲历者的创伤？

1945 年 4 月，也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刚开始在美国被大量报道的时候，它并不被称为“大屠杀”。^② 在媒体的爆炸式报道中，刚刚发

① 关于“全人类的创伤性事件”（traumatic event for all of humankind），作者在注释 2 中解释说：“被界定为对全人类都造成创伤的事件并不意味着这个事件照字面意思必须是全人类共同经历的，也不必被描述成如此。”中文版，周怡等译，第 193 页（英文版无此注释）。

② mass murder/massive killing 和 Holocaust 虽然都可以翻译为“大屠杀”，但这两个术语/表达法在亚历山大的著述中具有重要的区别。首先，前者可以是各种各样的集体谋杀或大规模屠杀，而后者则专指二战时期纳粹对于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其次，即使都是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这个特殊事件，Holocaust 这个词在他那里特指经过悲剧叙述建构的、具有特殊含义的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而 mass murder/massive killing 虽然所指为同一个事件，其文化、道德意义却并不相同，因为它从属于另一种关于犹太人大屠杀事件的叙事，在本文中即进步叙事。为此，笔者一律将 Holocaust 译为“大屠杀”，而将 mass murder/massive killing 译为“集体谋杀”或“大规模杀戮”。亚历山大所要表明的一个重要主题是：Holocaust 是一个相对晚近才出现的术语，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 - 符号的建构。

现的纳粹集中营被归入“暴行”(atrocities)。它尽管残酷、恶心、奇特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仍然与其他野蛮行为同归为一类,都被视作不自然的病态心理(ill mind)的自然结果。“暴行”是一个特别联系于战争的能指,它可以指所有战争造成的伤害。美国媒体把在集中营的发现称为“暴行”,意味着纳粹大屠杀一开始被当作了一般战争暴行。^①更有甚者,在1945年4月3日美国步兵首次发现集中营之前,关于集中营的很多报道还遭到普遍质疑。比如早于美国人的发现三个月(准确时间是1945年1月27日),苏联就发布了在波兰的集中营发现。但美国人难以相信这个发现,因为它和他们在20世纪的经验太隔膜以至于失去了可信性。直到1945年4月3日美国媒体发布美军自己的集中营发现,早先一些的报道才被追溯为“事实”。

而且,即使集中营的发现被承认为事实,即使纳粹暴行被普遍指认为代表了极度的非正义,但对于非亲历的听阅人(读者/观众)而言,却没有成为他们自己的创伤经验。这是为什么?亚历山大认为,这是更为紧要的问题。

正是在这里,文化建构的作用显示了出来。因为听阅人要把那些非亲历的事件体验为创伤(英文为traumatized,直译“创伤化”,意为感受到创伤),并予以心理认同,必须通过特定的符号操作把大屠杀的创伤普遍化。这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也是叙述的过程。但是在集中营刚刚发现的时候,美国媒体对犹太人受害者的叙述恰恰与此背道而驰。这个时候的美国媒体采取的是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和特殊化叙事。前者是指:刚刚在集中营发现的犹太人被叙述和再现为另类,他们似乎是来自火星或地狱的“外族人”,他们没有被人格化(personalized),也就是说,没有被视作具体的个体人,而是被再现为“大众”(mass),甚至傻乎乎、臭烘烘的脏东西(mess)。这使得受害者的创伤难以引起美国听阅人的强烈认同。特殊化则是把受害者视作一群具有历史和种族特殊性的群体(与“我/我们”不同),把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mass murders)联系于特定的历史冲突和种族冲突,受害者是犹太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人类”。与犹太人相比,美国人的同情和认同感更多也更容易给予那些情况好一些的德国受

① 最初美国关于二战“暴行”的报告甚至没有涉及纳粹,更不要说犹太人牺牲者,而是集中在日本1943年对于美国及盟军俘虏的“野蛮对待”。

难者或波兰受难者，“他们看上去好像更正常，更像人一些。”（中文 200，英文 28）英美两国官员对犹太人难民显得不耐烦，即使是移民名额的分配也是德国人最多，犹太人最少。

要想超越特殊化和去人格化这两种符号和叙述方式，使犹太人的遭遇得到非亲历者的认同，必须经过相反的符号建构，这就是亚历山大反复强调的符号扩展（symbolic extension）。只有通过符号扩展，“大屠杀”所代表的恶才能超越特殊性，获得普遍性。大屠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恶？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埃利·威瑟尔（Elie Wiesel）认为，这是一种本体论的恶。但在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看来，这个本体论的恶是通过编码被叙述和建构出来的。如果没有特定的编码过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发现本身只是一堆数字，而不会自己把自己呈现为“恶”。一种暴行要变成本体论的恶，首先而且最终必须依赖于编码或表征。“依赖于表征的性质，一个创伤性的事件可能被表征为本体论的恶，或者，它的邪恶性也可能被表征为偶然的（contingent）和相对的，是可以克服的。”（中文 29，英文 201）亚历山大甚至认为，即使是“恶”（evil）这个范畴也是建构的而非自然存在的，是文化和符号运作的结果。“一个创伤性的事件要获得恶的性质，是一个变成恶的问题。这是一个创伤如何被认识、被编码的问题。”（中文 29，英文 202）

那么，这样的建构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首先是所谓物质“基础”，也就是对于符号生产的控制权。这是一个最唯物、最世俗意义上的文化权力问题：谁有权来讲述故事？很长一段时间内，纳粹对媒体的控制使得人们无法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表达（frame，准确的意思应该是把对象纳入一种叙事框架）犹太人大屠杀。而当盟军结束集中营屠杀的时候，是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控制了媒介权力，支配了对大屠杀的编码。可以说，如果盟军没有赢得战争，“大屠杀”（Holocaust）就永远不会被建构出来。比如，如果是苏联而不是盟军“解放了”大多数的集中营（不只是欧洲东部地区），那么，在集中营的发现也不可能通过类似的方式得到表征。“正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符号生产的工具不是被控制在一个凯旋的战后纳粹政权或凯旋的共产主义政权（指苏联，引注）手中，这些大规模屠杀（mass killing）才得以被称为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并被编码为邪恶。”（中文 30，英文 203）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朴素但深刻的唯物

主义观点。

其次是对大屠杀的评估。即使当符号生产的工具逐渐被“我们这一边”控制，即使纳粹的“邪恶”被公认，这也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接下来的问题是评估（weighting）：邪恶到何种程度？对邪恶的性质与程度的测定会在随后的归责、惩罚、治疗、未来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谁负责？谁是牺牲者？创伤行为的直接和长久的后果是什么？亚历山大说：“这就意味着，即使在盟军的军事力量胜利之后，即使集中营在物质上被发现之后，见到和发现的东西之性质仍然需要得到编码、评估和叙述。”（中文版 31，英文版 204）而且这个复杂的文化建构必须立即完成，因为历史并不等待。

三 进步叙事及其缺陷

在二战胜利后，大屠杀的叙事权当然已经不成问题，美国不仅已是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文化上也如此。问题在于如何对大屠杀进行编码和叙述。

编码和叙述的过程也就是归类（typified）的过程。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发现一个东西的时候，不管这个东西如何新奇，如何离奇古怪，它也被常常被归入人类的语言、表达法与叙事模式中已有的范畴或类别，被解释为已经知道的某种东西，或某种现有范畴的一个例子。这样一来，极度陌生的东西也就变得不那么陌生了。这就是说，在对集中营的发现进行编码、权重和叙述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些范畴、解释框架和叙事模式，对大屠杀的符号建构具有极度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创伤事件的最初看法，还是随着历史变化出现的后来看法，文化结构和解释框架都是关键性的。

大屠杀被报道后，人们能够找到的现成的也是占主流地位的叙事模式，就是进步叙事。所谓“进步叙事”，是指在叙述纳粹主义的时候“给出了一个救赎的诺言，激发出一系列带来希望和信心的行动”。（中文 36，英文 209）因此它是一种结束—光明叙事。它宣称纳粹主义已被击败并将从世界上消灭，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在新时代也终将被克服。亚历山大指出，这个叙事框架的进步性和乐观主义“依赖于将纳粹主义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从而防止这个绝对恶的表征泛化，并防止它的文化力量以任何方法、

方式、形式与善的力量相提并论。”（中文 36，英文 209）也就是说，进步叙事强调大屠杀之类邪恶的特殊性、偶然性和短暂性，这就使得关于它的表征不能被普遍化。^① 在这个叙事中，纳粹主义只与特定历史事件、特定的组织者、特定的政党及其“疯子”领袖相关。正因为它是特殊的，因此也就是短暂的和偶然的，是一个“过渡性的创伤”（中文 36，英文 209）。“这样，这个精神创伤就能够而且必将通过一场正义的战争和一段明智而宽容的和平去除。战争所要求的大量人员牺牲也是在这个进步叙事的框架下，根据它所承诺的弥补来测量和判断的。数以百万计人的牺牲能够被弥补，他们神圣灵魂的社会弥补不是通过以眼泪来悼念他们的死去来实现，而是通过消灭造成他们的死亡的纳粹病规划建立一个再也不会会有纳粹出现的未来而实现的。”（中文 36，英文 209）

亚历山大指出，在进步叙事框架中揭露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杀戮，把纳粹叙述为非人道的绝对恶，在 1942 年、1943 年间非常流行，屡见不鲜。但同时，对于非犹太人的听阅人而言，犹太人的苦难只不过作为一个例子证实了“绝对恶”这个范畴，纳粹大屠杀的独一无二的、反常的性质没有了。“犹太人受害者所经历的这场非同寻常的创伤，却被由他人构成的观众（audience of others）经验为对一个范畴（即非人道的绝对恶，引注）的证实。正因为如此，而且通过这种方式，集体谋杀新闻的民主派观众所经验的是与创伤受害者的距离而不是认同。（新闻对于谋杀行为的）揭露在某种悖论的意义上产生了将不正常的东西正常化的效果。”（中文 37，英文 210）由于这种归类导致的“正常化”，震惊感没有出现。奥斯维辛被纳入进步叙事，在这种叙事中，犹太人大屠杀不可能被建构为“犹太人大屠杀”（原文：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Holocaust into the “Holocaust”，后一个 Holocaust 被加引号，目的是强调这次犹太人大屠杀的独一无二性，参见英文版第 210 页）。作为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独特事件，被当作了一般化的战争故事，作为特殊的集中营而不是一般死亡营的奥斯维辛，也没有得到特别重视。这种去特殊化处理是进步叙事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这样的叙事中，

① 如果联系中国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关于“文革”叙事，也会发现类似的进步叙事，它也是把十年浩劫（灾难）定位在“过去”，定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把灾难的原因定位于“一小撮”野心家的个人邪恶。而小说的结尾一定是一个光明的开始，新时代的来临。